

● 房锐主编

唐五代文化论稿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

唐五代文化论稿

● 房锐主编 ●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五代文化论稿/房锐主编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 2006. 8
ISBN 7-80659-875-8

I. 唐... II. 房... III. 文化史—研究—中国—唐代 IV. K242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6349 号

.....

唐五代文化论稿

房锐 主编

责任编辑	李 嘉
封面设计	李文金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
网 址	www.bsbook.com
发 行	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0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03mm×140mm
印 张	11
字 数	250 千字
书 号	ISBN 7-80659-875-8/I·284
定 价	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主 编 房 锐
编 写 王红霞 刘 艺 李 凯
汤 洪 房 锐 罗 宁
武丽霞 赵俊波 谭 敏

基金项目：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 2003 年度重点研究项目

目 录

独具特色的李峤《杂咏诗》	刘 艺 (1)
杜甫边塞诗及其价值评判	刘 艺 (27)
论杜甫的亲情诗及其特点	武丽霞 (51)
杜诗的西域文化背景	李 凯 (70)
《九成宫》与《登凤凰山寻故宫遗迹》试探	房 锐 (82)
杜甫对晚唐五代文人的影响	房 锐 (93)
论权德舆的儒、释、道观	王红霞 (101)
陆长源及其著述考论	罗 宁 (118)
《唐史所见张建章其人》辨析	房 锐 (153)
《〈册府元龟〉引唐实录、杂史、小说考》辨析	房 锐 (163)
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匡补	房 锐 (174)
杜光庭《道教灵验记》研究	谭 敏 (186)
文谷及其《备忘小抄》考论	罗 宁 (257)
从《北梦琐言》看晚唐落第士人的心态	房 锐 (270)
从《北梦琐言》所载史事论冯道	房 锐 (280)

唐五代人笔下的屈原形象	房 锐 王红霞 (293)
论唐代律赋语言的雅正特点	赵俊波 (306)
五代赋辑补	赵俊波 (324)
蜀石经产生原因试探	汤 洪 (338)
后 记	房 锐 (348)

独具特色的李峤《杂咏诗》

刘 艺

李峤，字巨山，赵州赞皇（今河北赞皇）人，生于贞观十九、二十年（公元645—646年），卒于开元二、三年（714—715）^①，一生历仕高宗、武后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五朝。《旧唐书·李峤传》说他：“为儿童时，梦有神人遗之双笔，自是渐有学业。”足见其早慧多才。其诗今存二百零九首，历代对之评价颇有异同。

人称“为文精壮”、“诗法特妙”^②的开元名相张说称赞李峤：“李公实神敏，才华乃天授。睦亲何用心，处贵不忘旧。故事遵台阁，新诗冠宇宙。在人忠所奉，恶我诚将宥。南浦去莫归，嗟嗟蔑孙秀。”^③在评诸学士之先后时，张说又云：“李峤、

① 参见傅璇琮主编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卷一《李峤》笺证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。

② 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卷一《张说》。

③ 张说《五君咏五首·李赵公峤》，彭定求等《全唐诗》卷八六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。

崔融、薛稷、宋之问，皆如良金美玉，无施不可。”^①《旧唐书·徐彦伯传》称：“苏、李文学，一代之雄。”《新唐书·文艺中》称：“苏、李居前，沈、宋比肩。”《新唐书》本传称：“峤富才思，有所属缀，人多传讽。然其仕前与王勃、杨盈川接，中与崔融、苏味道齐名，晚诸人没，而为文章宿老，一时学者取法焉。”由此，峤之盛名可知矣！然后世论者往往贬之，清人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卷二评其咏物诗云：“李峤称‘大手笔’，咏物尤其属意之作，裁剪整齐，而生意索然，亦匠笔耳。”至今文学史中仍坚持此说：“乍看题目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实际却充满陈腐的堆砌和连篇累牍的隶事用典，毫无生气，使人腻而生厌。”“这些‘一字题’的逞才之作，连同他的十余首按照节令月份排列的《×月奉教作》等，都是应制诗的不同表现形式，不过小弄巧笔，无大意义。”^②综观诸多评价，问题的关键往往出在对《杂咏诗》的认识上，从此入手，我们或可看清李峤诗之本来面目，并予以恰当的评价。

初唐已步入一个诗的时代，在众多类型的诗歌创作中，李峤的《杂咏诗》尤为与众不同。

一、《杂咏诗》的形式、内容、体系及风格独具特色

《杂咏诗》是很特别的一组诗。从形式上看，它是五言律诗，在五律逐渐规范化、定型化之际，李峤创作出一百二十首五律，

① 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八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。

② 乔象钟、陈铁民主编《唐代文学史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。

的确不凡。加上其余作品，其五律诗共达一百六十余首，占其作品的多半，这使之成为初唐“沈宋”之前五律创作最多之人。而且其五律创作刻画细致、炼句精警、音律和谐，在当时堪称典范。

从内容上看，一百二十首诗全是咏物诗，数量之巨大，涉及范围之广泛，堪称初唐咏物诗创作之冠。在如此大规模的咏物诗创作中，李峤几乎不用生僻之字、词、句，如其咏《竹》：“高竿楚江滨，婵娟含曙氛。白花摇凤影，青节动龙文。叶扫东南日，枝指西北云。谁知湘水上，流泪独思君。”^①即便是今人，在无注释的情况下也能读懂。其用典也多是广泛流传的基础知识，十分浅显。如咏《日》的“日出扶桑路”，典出于《淮南子·天文》：“日出于暘谷，浴于咸池，拂于扶桑，是谓晨明。”咏《马》的“天马本来东”，典出于汉武帝《天马歌》：“……天马来，历无草，经千里，来东道。”咏《李》之“王戎戏陌辰”，典出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：“王戎七岁，尝与诸小儿游。看道边李树，多子折枝。诸儿童走取之，唯戎不动。人问之，答曰：‘树在道边而多子，此必苦李。’取之信然。”用的是王戎七岁与诸儿戏于陌上，见道旁李树，多子枝断，断为苦李之典。咏《史》的“马记天官设，班图地里新”，列举了史书之代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司马迁《史记》中有《天官书》，班固《汉书》中有《地理志》。咏《纸》之“妙迹蔡侯施”，用的是《后汉书·宦者传》载黄门侍郎蔡伦造纸之典。咏《海》之“楼写春云色”，用的是《史记》卷二七《天官书》“海旁蜃气象楼台”之典，这都比宋代吴淑《事

① 《全唐诗》卷六〇，下引《杂咏诗》均出自此卷，不另出注。

类赋》中的用典浅显得多。

从结构体系上看，作者极具理性地运用主题类分法，构筑起一个庞大、严密、有序的体系，将乾象、坤仪、芳草、嘉树、灵禽、祥兽、居处、服玩、文物、武器、音乐、玉帛凡十二部一百二十样事物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，这在诗歌史上是前无古人的。即便在整个唐代，也显得与众不同。万曼在《唐集叙录·韦苏州集》中说：“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，也不分体。宋人编定唐集，喜欢分类，等于明人刊行唐集，喜欢分体一样，都不是唐人文集的原来自面目。”这说明主题类分体系在唐初虽较发达，但在实际的诗集中，尤其具体到一组诗中，并不常见。整个唐代对诗作进行主题类分的，也不过李峤、白居易等两三家。

从风格特色来看，诗中李峤本人的个性特色比较淡，很少加入个人的忧喜感慨，作者之主要精力似集中于形象地描绘事物、隶事用典、音律对仗等方面，各诗仅在结尾部分稍加引申，抒发一些大众化的情志。我们知道，作诗、评诗一般是很重视抒己之情，言己之志的，而此诗却显得异乎寻常。且不与他人诗歌作比，仅与李峤自己的其余诗作相比较，不同之处已十分明显。历代评峤诗者，若有所称赞，必是《杂咏诗》之外的作品，因为在那些诗中，写景抒情多是即兴而发，有情感寄托。比如当今文学史中一致认为其诗尚可取的，多是《送李邕》、《钱骆四二首》、《倡妇行》、《汾阴行》等感情色彩较强的作品。尤其是《汾阴行》，在今昔的强烈对比中抒发历史感、怀古情，心灵感召力很强。后来安史乱起，整整一代人的盛衰之感都被引发出来。在此巨变中唱主角的玄宗，听到乐人唱此词，更不免为之动容：“天宝末，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，命梨园弟子歌数阙，有唱李峤诗者

云：‘富贵荣华能几时，山川满目泪沾衣。不见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飞。’时上春秋已高，问是谁诗，或对曰李峤，因凄然泣下，不终曲而起，曰：‘李峤真才子也。’又明年，幸蜀，登白卫岭，览眺久之，又歌是词，复言‘李峤真才子’，不胜感叹。时高力士在侧，亦挥涕久之。”^① 谢榛在《四溟诗话》卷四中誉之为初唐七古第一，“止以古雅为命，不以雕篆为工”^②的《唐文粹》将之收入伤感类，《搜玉小集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诗纪事》也收录此诗，都是事出有因的。另外，从李峤《〈楚望赋〉序》对张说的评价中，我们也可看出他对强烈情思的肯定及对“情”的自觉：“达节宏人，且犹軫念；苦心志士，其能遣怀。是知青山之上，每多惆怅之客；白苹之野，斯见不平之人。”^③ 无论从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看，李峤都不是个无视“情”的人。但在其《杂咏诗》中，个人情感却较淡，显然非即兴而发，乃有意为之，“做”的痕迹较为明显。

二、《杂咏诗》之传播独具特色

从传播角度看，李峤《杂咏诗》以独特的方式流传，并有着持久性和极强的渗透力。

首先是持久性。这可从李峤诗与同时代其他人作品流传之比

① 事见孟棻撰、李学颖校点《本事诗·事感第二》，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计有功著、王仲镛校笺《唐诗纪事校笺》卷十《李峤》，巴蜀书社，1989年。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卷一《李峤》。

② 姚铉《唐文粹序》，姚铉编《唐文粹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6年。

③ 见董浩等《全唐文》卷二四二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

较中、从李峤《杂咏诗》和他的其余作品流传之比较中看出。在初唐，与李峤齐名的诗人很多，《新唐书·杜审言传》说杜审言“少与李峤、崔融、苏味道为文章四友，世号‘崔、李、苏、杜’”。与这些人相比，李峤的诗流传至今最多。苏味道今存诗十六首。杜审言，《全唐诗》编其诗一卷，计三十九题四十三首。崔融诗传下来十七题十八首。独李峤诗今存二百零九首，其中《杂咏诗》作为一个完整体系，流传至今，更是与众不同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李峤集》五十卷，《杂咏诗》十二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“《李峤诗》十卷，《李峤新咏》一卷”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上别集类云：“《集》本六十卷，未见，今所录一百二十咏而已，或题曰《单题诗》，有张方注。”则宋时《李峤集》已不易见到，而其《杂咏诗》却一路流传下来，当有必然原因。

其次是广泛性。《杂咏诗》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，甚至还渗透到异国文化之中。在内地的广泛传播，从上文的官私著录中已可见一斑，更奇特的是它在边远的敦煌、隔海的日本，都广泛流传着。

在敦煌文献中，存有《李峤杂咏注》残卷（张庭芳撰，斯555，伯3738），王重民在《敦煌古籍叙录》中说：“斯坦因所得555号，为残诗十七行，有注；伯希和所得3738号卷，仅六行，诗注均相似，书法亦同，知为同书，恨不知书名与撰人姓氏。刘修业女士为东方语言学校编所藏华文书目，偶检《佚存丛书》本《李峤杂咏》，谓即此《杂咏》残卷，余检阅良然。更阅卷端张庭

芳序，而知此残卷诗注，即张庭芳所撰者。”^① 则其诗并注，唐时已远传边地。

在日本，李峤《杂咏诗》流传既广且久，影响颇大。此诗约在盛唐时已传入日本。现存最早抄本是嵯峨天皇（809—823 在位）宸翰本，即天皇曾手写李峤此诗二十一首，此真迹被视为日本国宝，今存东大寺正仓院。至平安朝中期（867—1086），《李峤百廿咏》与李翰的《蒙求》、白居易的《白氏新乐府》被列为从中国传入的三大幼学蒙书，在日本广泛流传^②。《日本见在书目》著录的除天皇手写本外，还有二卷本古抄。今存建治三年（1277）抄本，题作《李峤杂咏百廿首》，卷末还附唐天宝六载（747）张庭芳撰注之序，嘉庆间日本天瀑《佚存丛书》本即据此刻成，前有天宝六载登仕郎守信安郡博士张庭芳撰序。可见日本人还从中国带回了此诗之注，以便习用参照。

在平安末期（1086—1192）及镰仓时期（1192—1333）成书的日本古籍，多引用张庭芳注，如藤原敦光的《私藏宝钥钞》、无名氏的《幼学指南钞》、藤原清辅的《奥义抄》、信阿的《和汉朗咏集私注》、《三教指归注》和《白氏新乐府略意》、菅原为长编的《文风钞》、空海诗文集《遍照发挥性灵集》的今存最早注书《性灵集略注》等。而且生活在院政、镰仓初期的学者源光行（长宽元年—宽元二年，即 1163—1244）曾著有《百咏和歌》十二卷（元久元年，即 1204）。到目前，日本已发现《李峤百廿

① 万曼《唐集叙录》之《李峤集》条，中华书局，1980 年。

② 参见川口久雄《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》第二十四章第六节，明治书院，1961 年。

咏》的白文本三类二十余种,《百廿咏诗注》旧抄本三类八种^①。数量之多,令人惊叹。这一点是初唐其他作家的作品难以达到的。

第三,《杂咏诗》在传播过程中的最大特点是自行流传,一般不与李峤其他诗并行,人们也往往单独著录。

从前文所说《杂咏诗》传入日本的情况来看,盛唐传去的已是单行的《杂咏诗》了,后来流传的也均是单行单注本。另外,在敦煌发现的《李峤杂咏注》也表明早在唐代此诗就是单行单注的独立体系。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个与李峤相关的材料,即《珠英学士集》残卷。则天敕修大型类书《三教珠英》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类书类有载,今已全佚,但崔融集珠英学士李峤、张说等四十七人诗为《珠英学士集》,计五卷二百七十六首诗,据人物官品级别进行分类,选集作品出自各人的作品集。这一初唐精选文人集,在当时影响很大,但元以后散佚,却有幸在敦煌石窟中发现其残卷。此乃敦煌唐人诗集中唯一见于历代著录的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:“《珠英学士集》五卷。崔融集武后时修《三教珠英》学士李峤、张说等诗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十集部总集类、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五四都有著录。此残卷包括斯2717和伯3771两个写卷,斯卷存诗36首,伯卷存诗17首,共

^① 详见李峤撰、张庭芳注、胡志昂编《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·前言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0—13页。

计 11 人诗 53 首^①，其中无李峤诗，可见峤诗属缺失部分。全集四十七家诗二百七十六首，《杂咏诗》一百二十首不在其内。这也是其单行流传之旁证。

《杂咏诗》不仅单传，且单行著录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都对此诗单提一笔，显得颇与他诗不同。唐诗的流传方式多种多样，有总集、别集、选集等，但很少有某一人的某一组诗单行的（白居易有新乐府单行本《白氏讽谏》，《读书敏求记》说“其字句与总集中稍异”，恐怕不是从《白氏文集》中录的，而此诗亦属有特殊功用的一类）。作者其他咏物诗并未与此一同单行流传，而其他作家的咏物诗，数量较多，也不单行，如太宗写有为数不少的咏物诗，也可按类去归置，但并未单行。在这一点上，《杂咏诗》更显特殊。

三、《杂咏诗》版本、注释之与众不同

首先，从白文版本来看，此诗在日本、敦煌、内地所传版本十分繁多，粗略统计，仅在日本就有三大类二十余种，且各版本差异颇大，存在大量异文现象。有的是字词不同，如咏《日》诗末句：“朝夕奉光曦。”“光”一本作“尧”。咏《松》诗尾联：“岁寒终不改，劲节幸君知。”一本作：“岁寒知不及，多节幸君知。”有的是一联不同，如咏《雪》之“地疑明月夜，山似白云

^① 参见王重民《敦煌古籍叙录》卷五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58年；王重民原编、黄永武新编《敦煌古籍叙录新编》第十六册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6年；王重民《补全唐诗》，收入《全唐诗外编》；徐俊校辑《珠英学士集》前记，见傅璇琮编撰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。

朝”，一作“龙沙飞正远，玉马地还销”。咏《萱》之“黄英开养性，绿叶正依笼”，一作“叶舒春夏绿，花吐浅深红”。更有全诗皆异的，如咏《莺》：“芳树杂花红，群莺乱晓空。声分折杨吹，娇韵落梅风。写啭清弦里，迁乔暗木中。友生若可冀，幽谷响还通。”又作：“睨睨度花红，关关乱晓空。乍离幽谷日，先啭上林风。翔集春台侧，低昂锦帐中。声诗辨转黍，此兴思无穷。”仅从《全唐诗》中辑录之“一本”，已可见不同，若与日藏本、敦煌本共校，差异更大。

一般作品各版本文字有异同，属正常现象。或为传抄之误，或乃后人有意更改。像李峤《杂咏诗》这样广泛更改，改动颇大，就有些与众不同了。这极有可能是作者在作进一步的修订。从李峤所处的特殊时代来看，五律正处于逐步定型之际，一百二十首诗不可能一气呵成，其间可能先作一部分，随即传抄于世。随着诗歌格律进程的发展，其中不合格律、不尽如人意之处便会显现，故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又不断修订，少数诗亦有可能重作，以图精益求精。胡应麟《诗薮·内编》卷四近体上云：“五言律体，兆自梁、陈。唐初四子，靡孱相矜，时或拗涩，未堪正始。神龙以还，卓然成调，沈、宋、苏、李，合轨于先；王、孟、高、岑，并驰于后。”许学夷在《诗源辨体》卷十四中说李峤“五言律在沈、宋之下，燕、许之上。其咏物一百二十首中有极工者”，可见李峤在五律定型过程中成就不凡。定型后的五律不用仄声韵，所以其诗平仄韵字混用的一类版本可能是过渡之作，后来的版本则均为平声韵。张庭芳注本序中说到“调谐律雅”，足见其版本为修订后的规范律诗。在修订中，“新诗”就会不断出现，故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《李峤新咏》一卷及张燕公之“新

诗冠宇宙”中的“新”字，很可能有所为而发。

其次，从《杂咏诗》的注本来看，情况也与众不同。诗注产生较早，注文非常基础，注本也不止一家。

《佚存丛书》本《故中书令郑国公李峤杂咏一百二十首序》中，张庭芳说其作注目的：“辄因注述，思郁文繁，庶有补琢磨，俾无至于凝滞，且欲启诸童稚。”^①他及时地为李诗作注，补充参考材料，使之更加简易化、普及化，以利初学。

一般诗作，同时代人都能理解，无须即刻作注，而李峤《杂咏诗》虽则简单，却还有人及时作注。从《雪》诗“大周天阙路，今日海神朝”、《旌》诗“方知美周政，抗旆赋车攻”中，我们可知其创作于武周之时（690—705）。李峤曾主持修撰大型类书《三教珠英》，其主题分类体系、事典等对《杂咏诗》的创作影响颇大，葛晓音先生将李峤此诗与《初学记》作过对比，其结论是：“‘百咏’从类目、物名到典故的编排方面，都带有类书的特色。”^②故此诗应创作于《三教珠英》之后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六《唐纪二十二》“则天后久视元年”记载：六月，“太后欲掩其迹，乃命易之、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《三教珠英》于内殿”。所以修书时间在久视元年（700）六月。王溥《唐会要》卷三六《修撰》类载：“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，麟台监张昌宗撰《三教珠英》一千三百卷成，上之。初，圣历中，上以《御览》及《文思博要》等书，聚事多未周备，遂令张昌宗召李峤、阎朝

① 此序《全唐文》卷三六四亦载，题同。

② 葛晓音《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歌的普及——从〈李峤百咏〉谈起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95年第6期。